

## 建構、消解與轉向

### ——論清末民初「英雄觀」的轉變

李 佩 蓉\*

#### 摘 要

本文使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數位文獻資料考察西元1830年至1930年間「英雄」辭彙的使用情形，依時代進展分「傳統英雄觀」、「1830-1895年——論述醞釀期」、「1895-1912年——焦慮闊論期」與「1912年後——批判轉向期」四階段論述之。研究發現，其間「英雄」所指稱的對象與內涵益加豐富多元，大抵這百年間，「英雄」觀念經過「官方論述→政治論述→文化論述」的演變歷程；辭彙意義從「一枝獨秀」的傳統式純粹菁英概念，轉向「百花競放」的群眾／個性化多元概念；相對於章回小說中所寄寓的「忠義英雄譜」想像，走過「甲午戰爭」到「民國成立」，1895-1912年間，中國思想界也經歷了一次「真實版」英雄譜的建構過程，其間的思想內涵融合中西，新舊概念以複雜的狀態交鋒嵌合，言說語調也更為焦慮急切。民國成立之後，英雄論述的熱潮漸退，其指稱意義也更為開闊而無特指，另有一道支流回歸「雄性」本色的性別指涉。如此的高潮迭盪，乃中國英雄想像「建構——消殞」的歷

---

\* 作者現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程，然所謂「消殞」並非總體英雄觀的瓦解，反而透露了時代變遷之下，英雄觀念「轉向」與個人價值醒覺的契機。

關鍵詞：英雄、英雄觀、菁英、關鍵詞、近現代

# Construction, Dissolving and Converting

——The Transition in the Ideology of Hero in  
Modern Chinese

Tracy Lee

## Abstract

This essay focuses on a Chinese vocabulary “hero (英雄)” in “the Database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s and Literature (1830-1930)”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 in which we can see there are four division of the usage of “hero (英雄):” “the traditional thoughts of hero,” “brewing discussion of hero (1830-1895),” “examining the definition of hero (1895-1912),” and “the turning of ideal hero (1912-).”

Surveying the hundred-year-crossing data, the idea of hero was commonly used in official document at first step; later on, “hero” was found generally in political discussion; at last, in cultural discussion. Traditional hero generally means an elite person necessarily outshining others especially in political or war prospect, and new ideal hero includes much more prospects, such as unsung heroes or normal people with greater personality.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hero was acknowledged in classical novels,

such as “zhong yi ying xiong pu” (name list of brave and righteous heroes, 忠義英雄譜). However, from Sino-japanese war of 1895 to the found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2, a new way of hero definition tried to contain east and west, old and new thoughts, being so eager to find heroes. Finally, public discourse started to take real people (ex. Dr. Sun Yat-sen) to build a name list of hero to cheer up the war-suffering citizen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lthough the heat of hero gradually went down, the definition of hero became broader, while there was a branch asking for male hero only.

The ups and downs displayed a passage of Chinese ideology of hero, of which the conception constructed and then dissolved. However dissolving does not mean disappearing. With the change of times, it is a symbol of the rising value of individual person.

Keywords: hero, ideology of hero, elite, keyword, Modern Chinese

## 建構、消解與轉向

### ——論清末民初「英雄觀」的轉變

李 佩 蓉

#### 一、前言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明·楊慎（1488-1559）〈臨江仙〉<sup>1</sup>

英雄登高一呼，叱吒風雲的氣勢叫人歎服；英雄與時勢對抗，而今安在哉的遭遇教人悵惘。英雄故事寄寓了百姓對於菁英領導者的期待，也是從古至今為人津津樂道的題材，英雄如何被想像、被言說，實透露各朝各代不同的時代願景與渴望。

英雄一詞在「經、史、子」部運用並不頻繁。<sup>2</sup>但在「集部」的

<sup>1</sup> 楊慎詞作，毛宗崗以此作為《三國演義》卷頭詞，為全書主旨定調。羅貫中：《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1年），頁1。

<sup>2</sup> 經部「十三經注疏」僅在《公羊傳》注疏中出現1次；史部「二十五史」合計使用189次，其中以《三國志》使用24次最高；子部則以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之《正統道藏》使用147次，次數最高，此間所謂「英雄」更指智識體悟上的高超，其次為（北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95次；徐珂撰《清稗類鈔》68次，其餘皆在50次以下。「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建置，網址：

使用則明顯出色，《水滸傳》出現217次，為集部之首，而《兒女英雄傳》、《說岳全傳》、《三國演義》與《隋史遺文》等章回小說分佔3、4、6、7名，<sup>3</sup>可見在清末以前，人們主要透過虛實相雜的小說題材創寫想像他們的救世英雄。

時至清末民初，西方勢力帶來實體破壞與文化衝擊，在那個人民亟需「被拯救」的時代，「英雄」的希冀需求又是如何被言說？箇中透露「英雄」觀念如何地轉型？此議題或可管窺中國近現代思想觀念轉型的關鍵。

## 二、傳統英雄觀

### （一）源於花、鳥的頌讚

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sup>4</sup>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sup>5</sup>

「英」、「雄」二字，在上古文獻典籍原以兩個單音節詞的形式使用。「英」字本義為「草本植物的花」，由此延伸出「花→優美、精華→傑出→傑出者」等意涵。亦即「英」「傑出者」的概念，是從「花的美好特質」比附到「人才之傑出」。《孟子·盡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sup>6</sup>「英」字作形容詞「傑出」講；而《荀子·正論》：「堯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ttswebquery?@hanjiquery>，檢索日期：2012年5月12日。

<sup>3</sup> 集部見於64本書，計1285個章節，依「英雄」一詞出現次數排序為：《水滸全傳》217次、《元詩選》160次、《兒女英雄傳》150次、《說岳全傳》106次、《全唐文》105次、《三國演義》95次。

<sup>4</sup> [晉]郭璞注：《爾雅·釋草》，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5年），卷八，頁144。

<sup>5</sup> [晉]郭璞注：《爾雅·釋鳥》，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卷十，頁187。

<sup>6</sup> [漢]趙岐注：《孟子》，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卷十三，頁233。

舜者，天下之英也。」<sup>7</sup>則直接以「英」字作為名詞「傑出者」，有超群、特出之菁英意涵。

至於「雄」字本義則為「雄鳥」，其意涵演化脈絡為「雄鳥→雄性→男性→雄壯→稱雄、勝出→傑出者」。《荀子·議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sup>8</sup>雌、雄對舉而以「雄」為勝出者。至桓寬《鹽鐵論·論功》：「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為諸侯雄。」<sup>9</sup>已有「傑出者」之意。「英」、「雄」二字雖本源不同，然殊途同歸，經延伸演化，皆有「傑出者」的意思，故而出現辭彙合併的契機。據葉常虹考察，東漢至魏晉時期，隨著人物品評風氣興盛，大量關於「英雄」的論述湧現，「英雄」亦多見合併使用，成為對於傑出政治人物的高度謳歌，形成「史傳政治話語範疇中的關鍵詞化」現象。<sup>10</sup>

## (二)「儒家精神」的標榜／悖離

「英雄」二字合用，最早見於東漢班彪（3-54）《王命論》：

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sup>11</sup>

漢高祖（256B.C.-195B.C.）開創威震天下的大漢帝國，也是史上第一個領導群眾反抗強權而勝出的平民皇帝，有「英雄」陳力相助。細觀此處英雄所佐之「帝業」，一方面具備了開創新局的「領導權威」，另一方面，亦包含了起義反抗（暴秦）的「反領導意識」，兩

<sup>7</sup> 李滌生：《荀子集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頁404。

<sup>8</sup> 李滌生：《荀子集釋》，頁317。

<sup>9</sup> [西漢]桓寬著，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九，頁544。

<sup>10</sup> 葉常虹：《英雄：一種流行於亂世的政治文化現象——以漢魏為考察範圍》（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195。

<sup>11</sup> [東漢]班彪：《王命論》，收於[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卷五九，頁1276。

者相關而又矛盾。至於「正史」又如何論英雄？以《三國志》為例，英雄一詞的運用仍處於「泛稱概念」階段。考察全書，除「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sup>12</sup>有明白指稱英雄人物為「劉備」之外，其他無一實指。其使用情形舉例如下：

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sup>13</sup>

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sup>14</sup>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sup>15</sup>

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sup>16</sup>

史料雖未明確指陳「誰是英雄」？但已透露亂世之中，群雄並起的局勢，期盼有人「總攬英雄」以武力「撥亂反正」，救民於水火。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世所期待的英雄既是將軍武將的身分，自也易於有擁兵自重，「矯命專制」的危險，顯示「英雄」概念與「武力」的密切結合，語義應用明顯偏向「雄」字的陽剛特質。演變至此，「英雄」除了被人期待，也帶有一些「以力凌人」的負面意涵，葉常虹指出：

「雄」者如此奇特地混合了才的「超凡」和德的不「入聖」，故不免對於「聖王」所代表的集權、意識型態和律令規範，構成

<sup>12</sup>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十四》（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十四，頁433。

<sup>13</sup>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十二》，卷十二，頁384。

<sup>14</sup>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十三》，卷十三，頁391。

<sup>15</sup>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五》，卷三十五，頁913。

<sup>16</sup>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九》，卷五十四，頁1261。



了另一股力量強大的侵蝕與挑戰。<sup>17</sup>

言其「超凡而不入聖」，乃相較於上承堯舜周公、講求德澤恩化的儒家「聖賢」風範而言。「英雄」忠乎？義乎？實難定位。若說「撥亂反正」，則與儒家的聖賢形象接近，然其「矯命專制」，則有逆反倫常的疑慮。「英雄作為」強調建功立業，既要帶領群眾「建」、「立」，勢必與既有的政治權威對立，也難免造成破壞與殺戮，則其所建「功業」，不盡然合乎儒家禮教倫常的規範。

但「英雄」既要「領導群眾」，勢必是能讓眾望所歸，是以這個與國家政權時有衝撞的「英雄」形象，又不時與儒家所標舉的「忠義思想」緊密扣連，以贏人心。從章回小說的脈絡來看，「英雄傳奇」系列的小說命名，常冠以「忠義」二字，明代《三國》、《水滸》更合刻為《英雄譜》，楊明琅（生卒不詳）〈敘《英雄譜》〉云：

惟地既非英雄抒泄之地，時又非英雄展布之時，而胸中有如許嶽崎歷落不可名言之狀，又不能槁項黃馘而老牖下。……然此譜一合，而遂使兩書英雄之士，不同時、不同地而同譜。<sup>18</sup>

二書以「忠義」的道德品質合譜，其忠義的「神話式」英雄建構，是明代亂世之中人民心理的需求滿足。<sup>19</sup>可見英雄的形象標舉，又被期待著扣合儒家的忠義觀來發揮，惟「忠義」如何定義，則有很大的詮釋空間。總體而觀，中國傳統英雄觀對於儒家思想展現了既標榜又悖離的矛盾關係。

<sup>17</sup> 葉常虹：《英雄：一種流行於亂世的政治文化現象——以漢魏為考察範圍》，頁40。

<sup>18</sup> 馬蹄疾：《水滸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6-17。

<sup>19</sup> 洪詠秋：《「三國演義」與「水滸傳」英雄觀之探析》（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 (三)「想像英雄譜」的建立

清末面臨時代變局之前，人們透過史實、虛構人物的英雄搬演重構歷史，以「三國」和「五代」二個大亂世為突破點，甚至自行演出一整套從西周《封神榜演義》到明代當朝《英烈傳》的「第二歷史」，<sup>20</sup> 其間對於英雄人物的對象指稱及形象要求都有進一步著墨。以《水滸傳》為例：

正牌軍索超出馬直到陣前，兜住馬，拿軍器在手，果是英雄豪傑。但見：頭戴一頂熟銅獅子盔，……<sup>21</sup>

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sup>22</sup>

前者以英雄指稱「索超」，其後以賦體細寫其裝扮；後者寫「武松」，施恩父子因其「義士英雄」而另眼看待。小說中的「英雄」論述，不只有所實指，且透過衣著、他人對待等側寫，人物形象更趨細緻豐盈，大大彰顯了英雄「世上無雙」、「超群出眾」的姿態。陳平原（1954-）將《水滸傳》而下的一系列創作從《三國演義》一類的「歷史小說」區別開來，認為其間的英雄審美甚於歷史真實性的表述，更應稱之為「英雄傳奇」小說。<sup>23</sup> 章回小說的英雄想像，經歷了「草莽英雄→將門英雄→帝王英雄→平民英雄」的演變脈絡，透露平民企圖建立一個由下而上皆英雄的理想世界，最終回歸平民英雄，則可視為體系建構之後「英雄的泛化」。<sup>24</sup> 想像建構的過程之中，無形間拉近

<sup>20</sup> 歐陽健：《歷史小說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5、27、140-142。

<sup>21</sup> 施耐庵：《水滸全傳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1年），頁225。

<sup>22</sup> 施耐庵：《水滸全傳校注》，頁495。

<sup>23</sup> 陳平原：〈英雄與歷史：以民間敘事為根基——明代章回小說論略〉，《中國文化研究》第12期（1996年夏之卷），頁53-62。

<sup>24</sup> 草莽英雄如《水滸傳》；將門英雄如《說岳全傳》、《楊家府演義》；帝王英雄如《飛龍全傳》、《英烈傳》；平民英雄如《兒女英雄傳》。參見李宏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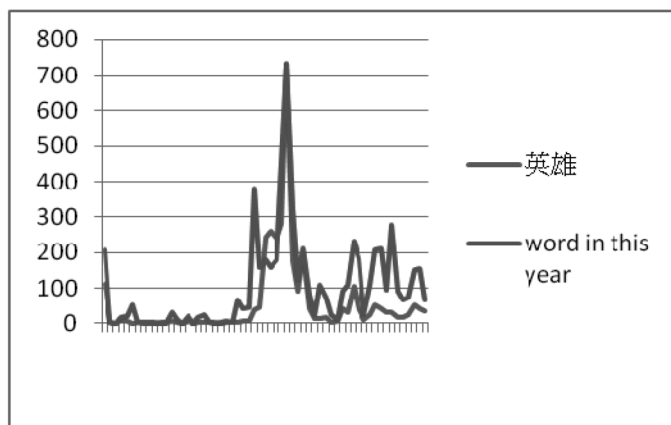
了英雄與民間的距離，英雄的庇護與陪伴，成爲人民寄望美好盛世的安全感來源。

至清代，英雄傳奇故事與才子佳人題材結合，出現了《兒女英雄傳》等書，書中作者藉借帝釋天尊之口，言說有別於《水滸》以來，以陽剛、武力爲主的英雄觀：

這「兒女英雄」四個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兩種人，兩樁事，誤把些使用氣力好勇鬥狠的認作英雄，又把些調脂弄粉、斷袖餘桃的認作兒女，……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兒女心腸；有了兒女真情，才做得出英雄事業。<sup>25</sup>

作者文康（生卒年不詳）活動於清中葉嘉慶（1796-1820）年間，此段話把英雄的剛勇形象注入了至情至性的性格特質，雖全書書寫不見得彰顯出如此境界的英雄形象，然其「剛柔並濟」的形象卻也開啟了英雄性格的另一重可能，成爲後世英雄觀轉向的伏筆。

### 三、1830-1895 年——論述醞釀期



圖一：「英雄」一詞的使用次數

〈英雄傳奇小說與英雄觀的演變〉，《語言文學研究》（2009年6月），頁10。

<sup>25</sup> 文康：《兒女英雄傳》（臺北：建宏出版社，1994年），頁4。

依「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sup>26</sup> 考察，「英雄」一詞於近現代百年間出現的次數共計3,198筆，使用總量之多，足見清末民初確是「英雄」被大肆言論的一段時期。其中最高峰出現在西元1903年，計731筆，次高峰為1897年，計379筆。（如圖一）

1830-1895年間，「英雄」辭彙使用計58筆，為數不多，辭彙多用於群臣奏疏等官方論述，仍多用傳統「泛論式」的英雄概念，如：

……俟 恩赦，中途即已脫逃。或甫經到配，旋即遠颺，其為強盜仍如故也。且自恃其善逃法網，呼朋引伴，號稱綠林英雄。<sup>27</sup>

此乃朝臣奏議，「英雄」只用作對於盜匪的通稱，不出《水滸傳》以來的英雄概念，亦非牽涉主旨表達的關鍵字詞。其他在內政運作方面論及英雄者，有論科舉，<sup>28</sup> 或作外交考察者。<sup>29</sup> 究其辭彙使用，可發現「英雄」本身皆非話題重點。

若從「量」的角度來說，透過西方的傳教著作介紹外國英雄，比例上甚且高於中國人稱述中國英雄，且「英雄」所指稱的對象多有實指，為中國帶來了一大批名字陌生而形象熟悉的外國英雄。透過西方英雄形象的加入，英雄特質的想像則稍有拓展：

唐朝年間，天主教之英雄勇武高興，赳赳武藝優嫻，奮然攻回回族。

<sup>26</sup> 本項研究中關於「英雄」一詞的資料，取自「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現由臺灣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辦公室提供檢索服務，謹致謝意。目前正由兩校共同完善、開發數據庫。本文引用自資料庫之文獻，本為簡體字，部分標點不完整，皆由筆者改為新式標點符號，以下不再贅述。

<sup>27</sup> 王榕吉：〈請盜案仍照原律定擬疏〉，收於〔清〕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1873年）。

<sup>28</sup> 如馮桂芬：〈變科舉議〉，收於〔清〕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卷66，〈禮政·貢舉〉（1861年）。

<sup>29</sup> 如王韜等：《法越交兵記》（1884年）紀錄法越交兵之事，並以「英雄」指稱助越與法軍作戰的劉永福。

英雄募庶民，曰，追國敵，天皇上帝交付之也。

國之英雄有遠遊之志，乘機駕船，望東北，向黑海而行，自不知其沿海之所之，正如瞎者暗中捉摸，冒危履險。<sup>30</sup>

可以看到西方的英雄論述加入之後，中國英雄較少關涉到的「宗教」與「航海冒險」等元素紛紛加入此一時期的英雄想像，也因而更強化了英雄「冒險」、「抗爭」的形象概念。但這個時期對於西方英雄的認知，與中國傳統「菁英領導者」的概念衝突不大，可視為下一階段中西劇烈衝撞的預演醞釀。

#### 四、1895-1912年——焦慮闊論期

甲午戰爭至民國成立前，乃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英雄」辭彙使用計1,424筆，明顯達到最高峰。此間英雄論述指稱對象明確化，發聲者也從群臣的官方論述改為民間知識分子的政治、文化論述。其中，梁啟超（1873-1929）的論點非常顯眼。<sup>31</sup>1898年〈佳人奇遇〉以三字句堆疊的排比句表達對英雄的熱切企盼：

余今尚記憶，餘昔在學校，愛英雄、仰英雄、夢英雄、心醉英雄！當時余惟信英雄之為英雄耳，問英雄之何以得為英雄？不能知也。

1899年〈自由書〉更大量談及英雄，並明確提出「英雄」與「時勢」的關係，將英雄寄寓為時代巨輪往前推展的重要推手；1902年，先

<sup>30</sup> 愛漢者：《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7年8月、1838年1月、1837年10月）。

<sup>31</sup> 以梁啟超、任公、飲冰子、中國之新民搜尋數據庫，共得計766筆。以下列舉之梁啟超著作皆收於《飲冰室專集》。〈佳人奇遇〉卷88（1898年）、〈自由書〉卷2（1899年）、〈新民說〉卷4（1902年）、〈新中國未來記〉卷89（1902年）、〈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卷12（1902年）、〈義大利建國三傑傳〉卷11（1902年）。

後發表〈新民說〉、〈新中國未來記〉，繼續頌讚英雄；〈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義大利建國三傑傳〉則以英雄指稱各國開國元勳。這段時期處於辛丑和約後，國家險遭瓜分的歷史關口，「時勢」與「英雄」的關係被強烈牽連，人們熱切渴望「英雄」能夠帶領民族百姓找到出路，梁氏於〈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以激進的口吻吶喊：

嗚呼！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吾以為必有能造出「造時勢之英雄」之時勢，然後英雄乃得有所造。

進入此一時期，對於「英雄」的談論更有意識，而對於英雄救世的渴望，也益加突顯。〈新民說〉則可見梁氏將「英雄」與「迂士」對舉，強調「英雄」在當代積極作為的重要性：

有排斥鄙人奮道德之論者，謂：「今日祇當求愛國忘身之英雄，不當求束身寡過之迂士。既為英雄矣，即稍有缺點，吾輩當恕其小節，而敬其熱心。」

梁氏指出時人必須發揮「愛國」的具體功效，而非只是獨善其身的道德實踐者。梁啟超以外，與之呼應的英雄論述猶多，眾聲喧嘩。

### （一）「民族英雄譜」的建立

晚清知識分子透過「神話」營造的方式，建構中國的民族英雄系譜，企圖召喚集體認同，凝聚國家意識。且因立場不同，促成了「抗禦外族」的民族英雄主脈，與「宣揚國威」的民族英雄分流。<sup>32</sup>前者為革命派所標榜，包括岳飛（1103-1142）、文天祥（1236-1282）、史可法（1601-1645）、鄭成功（1624-1662），乃至張獻忠（1606-1647）、洪秀全（1814-1864）及孫中山（1866-1925）；後者為改革派所標舉，

<sup>32</sup> 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頁81-158。

包括班超（32-102）、鄭和（1371-1433），及具有高尚思想號召力的人物，如南宋遺民鄭思肖（1241-1318）與清代曾國藩（1811-1872）等。考察「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230）」，不僅可見諸「民族英雄」被實際言說的狀態，更得一窺時人的危機焦慮感。

### 1. 正史、當代人物入系譜

中國的民族英雄被高度推舉，1903年以來，便出版關於鄭成功與岳飛的大量論述，其中更有後設分析此一心理的文論，如〈論中國人崇拜岳飛之心理〉云：

社會間而無英雄之一成份，則其社會必為他社會之所欺壓凌侮，而遂至於滅國，而遂至於滅種，無英雄之禍乃至如是。……英雄之不能無社會，社會之不能無英雄，其理固明。<sup>33</sup>

文中強調「社會不能無英雄」，否則將遭滅國、滅種，可見此時期不只崇拜英雄，且是「有意識」於自身崇拜頌揚行為的時代必要性，且對英雄寄予無比厚望：

然後知英雄之所以為英雄者，固恃希望為之先導。而智慮才略，皆隨希望以為消長者也。有希望則常人可以為英雄；無希望則英雄無以異於常人。<sup>34</sup>

此期英雄論述隨處可見類疊、排比句法，言說氣勢懾人。人們也樂於以各種方式「形容」英雄本身如何成為當世之英雄，崇拜景仰之情溢於「文」表。英雄列舉之多，甚連流寇領袖張獻忠也因「領導革命」的資歷被列入「英雄」名單！此間有為之立傳，稱之「莽英雄」

<sup>33</sup> 觀雲：〈論中國人崇拜岳飛之心理〉，《新民叢報》第3年第24號（原第72號），1906年。

<sup>34</sup> 無名氏：〈說希望〉，《新民叢報》第31號，1903年5月10日。

者，<sup>35</sup>亦引發不少譴伐反思，<sup>36</sup>在二十世紀初引起軒然風波。由是可見時人想要建立「民族英雄」體系以尋求民族認同的極端焦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時人也開始在「當世」推舉英雄譜入圍名單，如：

孫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敗之英雄也；非異國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雖屢失敗，而於將來有大望。<sup>37</sup>

其中特別提出「失敗之英雄」、「本族之英雄」概念，當然有無論成敗，欲將孫氏接續在「抗禦外族」的主流英雄名單的意味，亦是「當代人」被推為英雄的一項實例。在「英雄譜」的建構上，人們「選才」的眼光甚至快轉到「現代」，將未被歷史「蓋棺論定」的當世人物也列入「民族英雄」的行列。

在國勢危急之際，人們對於「英雄」的思考更深刻了，而企盼的呼聲也高過歷朝各代。於是，人們把「英雄譜」的名單從武松、李逵的章回小說世界拉回現實，重新在「史傳」中尋找真人實事為座標，重新建構一套更具「真實性」的朝代英雄譜，甚至等不得歷史定論，逕自將當代的名人也加入名單之中。在此時期甚至無暇喪氣地說「地既非英雄抒泄之地，時又非英雄展布之時」，<sup>38</sup>他們急切地大聲疾呼「這」就是我們應該熱切盼來英雄的世代。

## 2. 思想英雄受顯揚

在中國本土的英雄崇拜上，時人大大推舉明末思想家黃宗羲（1610-1695）為英雄：

<sup>35</sup> 無名氏：〈莽英雄殺人記〉，《江蘇》第7期，1903年10月20日。

<sup>36</sup> 如汪東：〈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民報》第2號，1906年。文中云：「崇拜革命之英雄而至於張獻忠，則是萑苻劇盜，剗刃他人之腹而不撓目者，舉從而崇拜之。可也耶？」

<sup>37</sup> 過庭：〈紀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民報》第1號，1905年11月26日。

<sup>38</sup> 楊明琅：〈敘《英雄譜》〉，收於馬蹄疾：《水滸資料彙編》，頁16-17。



嗚呼！黃梨洲而為流俗之所謂英雄者，則著者誠為重規疊矩，徒費楮墨矣。黃梨洲而為純正惟一之英雄，則我民族之特質、歷史之名譽所當保存之。<sup>39</sup>

英雄的意義在「拯救時代之需」，當人們揚棄了舊有體制，便需尋找可堪填補思想空缺的元素。1908年堅不仕清的明朝遺老黃宗羲由清廷認可，正式入祀文廟，<sup>40</sup>可見時人急欲為立憲運動找一個「中國式」的「現代轉型理想載體」，<sup>41</sup>才毋需在中西思想文化的交鋒承認「全盤皆輸」的窘況。此時的英雄論述，不再只是以往章回小說中「使用如何武器？」、「打殺哪隻猛虎？」的想像式描述，對於英雄的崇拜也不只以「武力」決勝負。人心經過動亂摸索，終於發現，世代正遭遇著「思想」層面的迷惘，而這更有賴英雄的引導，才好面對實施二千年帝國封建即將崩解的思想危機。

### 3. 外國英雄為借鏡

積極建立中國人專屬的真實版「英雄譜」同時，時人也更熱切引進西方英雄論述，更深入鑽研西方英雄之所以為英雄的思想內涵，以期知己知彼：

嗟乎！項王自刎於烏江，拿破崙老死於絕島。英雄末路，古今同慨然。項王不肯辱於漢兵，而拿破崙甘自困於海國，其慷慨激烈之慨，不及項王遠矣！<sup>42</sup>

際此風雨飄搖之日，回想漢武、唐太、明成時之國勢，安得不合人望？古遠集而起崇拜英雄之思想耶？嗟乎！在共和政治之

<sup>39</sup> 但燾：〈黃梨洲〉，《湖北學生界》第1期，1903年1月29日。

<sup>40</sup> 何冠彪：〈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入祀文廟始末〉，《漢學研究》第9卷第1期（1991年3月），頁71-89。

<sup>41</sup>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80。

<sup>42</sup> V.Y.C. 生：〈英雄逸話〉，《江蘇》第8期，1904年。

下所望乎？崧生嶽降者，欲得如華盛頓、林肯、羅斯福、威爾遜之人物耳。<sup>43</sup>

同樣是西方英雄的論述，但指稱對象已有挪移，從前期較多的宗教戰爭、歷史勇士介紹，轉為當代在民族獨立戰爭或思想上有所開創的人物。1895年《法皇拿破崙行狀》、《華盛頓傳》同年出版，<sup>44</sup>皆以「英雄」論之。稍後，1903年《鐵血宰相俾斯麥傳》、〈南阿獨立英雄古魯家略傳〉<sup>45</sup>皆是對民族戰爭、開國英雄的歌頌。同年出版之〈彌勒約翰之學說〉<sup>46</sup>及梁啟超〈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sup>47</sup>則提及思想界的「英雄」。尤其可見時人積極比較中、西英雄人物，企圖「以西人為鏡」，透過嚴肅的評判比較，從中汲取經驗教訓。

英雄相對應的希臘文為“hero”，最早來自神話中半人半神的形象。西方的英雄必須憑其意志，與「帶有情緒」的天神（如宙斯）、無法掌握的命運（如奧德塞的歸家險阻）乃至自身性格上的缺陷（如伊底帕斯的「追根究柢」）對抗，以求「人」的勝利與安頓，顏元叔（1933-）對悲劇英雄的本質的定義為「在有限時空從事無限追求」。<sup>48</sup>這與中國講求「天人合一」、「天命所歸」的英雄觀不同，中國領袖人物不是「天子」就是「謫星」，毋需與天命對抗。是以西方「英雄奮鬥歷程」的張揚在此時期更容易名正言順取得眾人景仰尊崇。（美）悉尼·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歷史中的英雄》指出：

<sup>43</sup> 吳貫因：〈英雄與社會〉，《大中華》第1卷第2期，1915年。

<sup>44</sup> 麥肯齊著，李提摩太譯：《法皇拿破崙行狀》，收於江都于寶軒驢莊輯：《皇朝蓄艾文編》，卷11，「君德」；遵義黎汝謙、番禺蔡國昭譯《華盛頓傳》，收於《時務報》，第6冊（1896年）。據「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檢索，「英雄」關鍵詞前後50字以內同時出現「拿破崙」者計114筆；同時出現「華盛頓」者計51筆。

<sup>45</sup> 《譯成功報》，收於《遊學譯編》，第6冊。

<sup>46</sup> 君武：〈彌勒約翰之學說〉，《新民叢報》第29號，1903年4月11日。

<sup>47</sup> 中國之新民：〈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新民叢報》第25號，1903年2月11日。

<sup>48</sup> 顏元叔：《莎士比亞通論——悲劇》（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7年），頁8。

所謂歷史上的英雄就是那樣一個人：在決定某一問題或事件上，起著壓倒一切的影響；而我們有充分理由把這樣的砸響歸因於他，因為如果沒有他的行動，或者，他的行動不像實際那樣的話，則這一問題或事件的種種後果將會完全兩樣。<sup>49</sup>

悉尼·胡克將英雄區分為「事變性人物」與「事變創造性人物」，前者是偶然走到成熟時機之上的尋常人；後者需則「把他們的個性積極地烙印加蓋在歷史上面」，以其非常的天才增加、觸發了時機的成熟，更細膩說明「英雄」與「歷史」的因果關係，如此概念與中國傳統的「時勢造英雄」之觀念相互對照印證，成為此期的當紅論述。

金觀濤（1947-）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為解決國勢危機，在思想上努力尋求突破，至此一時期而出現「中西二分式二元論」，將儒家的倫理思想留在家庭之內，「孝」的概念不再無限上綱為「忠」，好讓公領域向西方學習的舉動能與傳統儒家思想相安並存。<sup>50</sup> 忠與孝斷裂之後，連帶著以中國傳統「忠義」概念建立的「英雄觀」也有了可堪鬆動、新詮的空間，英雄在家庭之外的「公領域」如何實踐？有待西方相對應的英雄觀念來填補思想空缺。1897年嚴復（1854-1921）翻譯英人赫胥黎（1825-1895）《天演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傳入，為梁啟超等知識分子積極接受、傳布，從此「適者生存」的口號成為「變法圖強」的理論依據。<sup>51</sup> 那麼「英雄」便成為箇中可以帶領人們「適應時勢」的重要關鍵人物了！

## （二）英雄與時代議題的激盪

「英雄」既被如此焦慮而嚴肅地討論，自然而然產生與當代議題

<sup>49</sup> [美] 胡克著，王清彬譯：《歷史中的英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07。

<sup>50</sup>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81。

<sup>51</sup> 崔小茹：《清末民初的達爾文進化論》（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

碰撞的契機。除了「英雄為誰？」的指認，英雄的思考也連帶帶動時代議題的深入探究。

### 1. 英雄與科舉議題

以「英雄」這個「不合規矩」的形象談論「處處規矩」的時文科舉，充滿諷刺意味。早在1660年，姚延啟便以「宋太宗見制科取士，曰『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上奏，建議莫濫開科舉名額，以免導致「士風糜敝」。<sup>52</sup> 此處單純引用，未呈現上奏者對於科舉的看法，但已藉「英雄」指陳科舉取才之事。200年後，以英雄議科舉的論調再起：

人之心思材力，能復為讀書稽古有用之學者，莫善於時文，故毅然用之，其事為孔孟明理載道之事，其術為唐宋英雄入彀之術，其心為始皇焚書坑儒之心。抑之以點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恥，……<sup>53</sup>

文中雖云「有用之學莫善於時文」，但從其推論已微見馮氏對於時文的質疑，隱然揭開數十年後科舉存廢議題探討的序幕。甲午戰爭後，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益彰，科舉議題乃被「焦慮闊論」：

降及有明，以制藝取士，亦即暴秦愚黔首，故智羅致下上之人材，竭其心思材力於八股，遂使草澤英雄、風塵豪傑不得稍萌異。我朝沿之而不革者，二百數十年於茲矣。

……因思烽煙兵革不可久長，而欲柔順民風為治安之計，於是創為科試，誘以爵祿，使天下之英雄盡入吾彀，窮年兀兀，老死而不悔。<sup>54</sup>

<sup>52</sup> 見〈敬陳時務疏〉，收於邵之棠輯：《皇朝經世文統編》，順治十七年（1660），卷二七，〈內政部·治術〉。

<sup>53</sup> 馮桂芬：〈變科舉議〉，收於〔清〕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十六，〈禮政六·貢舉〉。

<sup>54</sup> 無名氏：〈論國家取士宜特設專科〉、〈論輕武重文實為弊俗〉，皆收於金匱闕鑄補齋編輯：《皇朝新政文編》，卷三，〈科舉〉，1902年。

科舉拘限知識見解、乃至阻礙改革維新的弊病被一一提出，言辭日趨激烈。有趣的是，時人談論科舉，不用仕子、文人等更為搭配的辭彙，卻偏偏屢屢關心起「英雄」的出處對待。與「英雄」不拘於時、勇於造勢的英姿對比，更突顯出八股固陋，再聞最初唐宋君王「英雄入彀」的豪語，形成不堪的對比。這也呼應了梁啟超所提，時人企盼「英雄」更甚「迂士」的觀點。

## 2. 英雄與性別議題

英雄之「雄」字，原有性別上的意義，但在正式的思想論述中，英雄美人的風流事蹟不是重點，「英雄」長期被當做「理所當然」的男性，論述與「性別」往往不見關聯。然就在這個極度混亂，眾「男性們」焦慮闊論英雄之際，隨著觀念開化，英雄論述中與「性別」相關的概念又被言說者「意識」到了。

英雄概念從古早的「英雄／美人」並舉，已有男女互動的指涉，此期如此互動再被提及，但不再停留於「英雄愛美人」的情愛關係，而有更多對於女性特質與女性力量的肯定：

女子者，天然富於感情之動物也。其愛力可以裁制英雄；其熱力可以左右世界。一顰一笑如大海之潮流，或哭或歌彌造化之缺憾，誠哉女子愛國心之特色，真善男子之所當頂禮膜拜。

要知道國家這個東西，我們女子也有分的。今國家弱到這樣，我們女子也有錯處。做貪官污吏的都是做丈夫、做兒子的人；做英雄豪傑的也是做丈夫、做兒子的人。<sup>55</sup>

此處女性的陰柔特質不再被動地拿來魅惑英雄，或僅被視為「紅顏禍水」，論述中更強調女子特質可以拿來「愛國」、「救國」。女子對於國

<sup>55</sup> 無名氏：〈支那女子之愛國心〉、〈同鄉會紀事（湖北之部）〉，《湖北學生界》第3期，1903年3月、第2期，1903年2月。

家時局的處境，也開始有了責無旁貸的使命感，女性更被期以「亂世生力軍」的厚望。英雄觀念與「性別」不自覺疏遠之後再回歸，雜揉了積極進取的愛國主義與方興未艾的女性意識，融合出獨具時代特色的呼之欲出的「女英雄」概念，促成「女性」重新回歸主流社會的一大進展。

另一個方向，「英雄」也開始由極宏闊、大我的公眾概念回歸「個人生命歷程」的「私領域」，還原了「雄」字之生物性特徵。以「英雄本色」檢索，最早出現於1897年「膽者，勇敢信託之謂也。不失英雄本色，行則行，止則止，無半點佞透難色。」<sup>56</sup>仍屬傳統的「武勇」英雄概念，但隨即在稍後的用法中出現歧義，部分時候轉用為戀愛中的雄性氣概，如1903年《愛之花》：

在戀愛勢利的地獄中掛一面大鏡子，點一盞明燈。也好了，現在的人都是受，只戀愛勢利的羈絆，墮入泥犁，他反說戀愛勢利是**英雄本色**，一邊答道。<sup>57</sup>

往後，二種意義兼有使用，至下一階段（尤其1920年之後）則明顯偏向戀愛相關主題，此一轉向可見「英雄」不再專指國家民族之抗爭菁英，反而回歸到最單純的個人、生物性的指稱。

## 五、1912年後——批判轉向期

民國建立後，「英雄」辭彙使用計599筆，質、量均再起變化。在「量」的方面，約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英雄辭彙的使用方明顯降低，在「質」的部分，則從前一期的「極度頌揚」轉為「質疑批判」。人們不再滔滔不絕敘述英雄建國的豐功偉業，或者企盼「時勢造英雄」，改而以冷靜批判的口吻，思考英雄在國家體制的意義，如

<sup>56</sup> 無名氏：〈俠會章程〉（續第38期），《知新報》第39冊，1897年12月。

<sup>57</sup> 儂更有情：〈愛之花〉，《浙江潮》第7期，1903年9月。

1913年吳貫因〈中國共和政治之前途〉云：

蓋專制國之君主，不能容英雄；民主國之國會，亦不能容英雄，其性質一也。然法國之國會，其所搗亂者，猶多屬有意識之舉動也；若我國之國會，則惟為無意識之搗亂而已。<sup>58</sup>

顯然「英雄」到了民主共和政體，其定位與姿態便需重新定義。過了推翻改革、開國立業的時機，國家政權一旦被確立下來，「英雄」對於政體的「方式」自然需要受到規範，以避免干擾總體秩序之穩定。此期社會渴求英雄救世的風潮漸褪，促使英雄的定義轉向，甚且正邪翻轉。

### （一）轉向群眾

考察「無名英雄」一詞，最早出現於1899年梁啟超《自由書》：

英雄者，即隱於世中之農夫、職工、役人、商賈、兵卒、小學教師、老翁、寡婦、孤兒、等，恒河沙數之無名英雄也。……若有欲頂禮於英雄下之人，請先頂禮此無名英雄之下，若有望英雄出世之人，請先望此無名英雄之出世。<sup>59</sup>

此處注意到各行各業對於國家社會之貢獻，但「焦慮闊論期」那個聚焦於建構英雄譜的時代，「無名英雄」在梁氏之後乏人問津，沉寂近二十年之後的1918年，孟和才又再度提及：

試想那些有名的英傑，若無此萬千無名英雄的通力合作，都向一個共同的目的努力的去做，又那能夠有今天的義大利呢？<sup>60</sup>

<sup>58</sup> 吳貫因：〈中國共和政治之前途〉（續），《庸言》第1卷第23號，1913年11月。

<sup>59</sup> 梁啟超：《自由書》，收於《飲冰室專集》，卷2，1899年。

<sup>60</sup> 孟和（陶履恭）：〈隨感錄〉26，《新青年》第5卷第3期，1918年9月。

文中提及開國英雄需有千萬無名英雄通力合作，乃能成功，無法實指的群眾力量與開國事業息息相關，但仍強調需有一「有名」的菁英英雄前導，帶領眾無名英雄。至1927年陳衡哲（1893-1976）〈婦女與職業〉云：

換句話說，做賢母良妻的人，都是一種**無名英雄**。她們的努力常在暗中，而她們的成績卻又是許多男子努力的一個大憑藉。她們是文化的重要基礎，……<sup>61</sup>

才算真正連繫上梁啟超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無名英雄的概念。英雄不再具有真名實姓，再從專指轉向泛稱，做為對「有偉大貢獻的人」的敬稱，且此處的「偉大」，已不限於開國、救民等大事業，只要在日常生活中貢獻一己之力者，便得享此封號。

## （二）蒙上負面色彩

民國之後，也陸續出現了「不需英雄」的論調，尤其《現代評論》雜誌多有此類看法，如：「人民的政治，不是等著英雄、豪傑或賢君、良相，乃是由人民的努力去組織好的政府，推行好的政策。」<sup>62</sup>面對國家前景，人們重新發現群眾的自發力量，「英雄」領導已然失去其不可或缺的關鍵地位。人們更重新檢視這群「人上人」的英雄作為，而有「抗英獨立的英雄據說不過是一個蓄奴甚多並且時常酗酒的田主」、<sup>63</sup>「這些英雄們享了那麼多的特權還以為不夠」<sup>64</sup>等等嚴厲批判。此期批判的矛頭，還特別瞄準了當時的北伐領袖蔣介石（1887-1975）。1927年陳獨秀（1879-1942）發表〈蔣介石反動與中國

<sup>61</sup> 陳衡哲：〈婦女與職業〉，《現代評論》二周年增刊，1927年1月。

<sup>62</sup> 陶孟和：〈中國人的政治能力〉，《現代評論》第4卷第97期，1926年10月。

<sup>63</sup> 信公：〈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家〉，《現代評論》第6卷第13期，1927年7月。

<sup>64</sup> 無名氏：〈時事短評〉，《現代評論》第6卷第148期，1927年10月。



革命)：

惟隱微中時時表露其**個人英雄主義**，表露其個人之權與力超於黨之上，離開黨的個人英雄主義，沒有黨的制裁，便會走到反革命，中外歷史上這種英雄很多，恐怕蔣介石也是一個。<sup>65</sup>

人們開始意識到單一英雄「權力龐大」的問題，排斥「個人式」的英雄崇拜。但如此轉變究竟是西方「個人主義」的理解與接受，抑或是對於「個性」的打壓，要求群眾「齊一化」行動的預告？在這裡出現了高度兩極化的意涵發展可能。參照其後的歷史發展，蔣介石「個人英雄主義」的批判一方面預示了之後共產黨群眾革命的緣由基礎，另一方面，也成為臺灣在「解嚴」走向人人可以自由表述的個人化時代的關鍵契機。

### (三) 回歸雄性概念

就「論述出處」而論，此期的英雄論述從社會政治版面向文學版面挪移，即便是關於西方英雄人物的論述，也從前一時期的「報導」、「他傳」形式，進入更富感性的「自傳」，乃至加入想像的「小說」形式，如《拿破崙之情網》(1915)、《普法喋血記》(1916)等，到了更晚，則愛情類小說、戲曲，如1928年小說〈舊夢〉、<sup>66</sup>獨幕劇〈結婚前的一吻〉<sup>67</sup>等更將英雄論往男女情愛的方向牽引。此期英雄與美人、女人、戀愛合用的情況愈來愈多：

至於在戀愛中具**英雄本色**，逐於北，逐於南，左之右之無往而不可者，失於彼則終可得於此，在他們，是儼然看透了現代女

<sup>65</sup> 陳獨秀：〈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嚮導》第198期。

<sup>66</sup> 懋琳：〈舊夢〉2至27期，多有使用「英雄」二字，見《現代評論》第7、8卷，1928年。

<sup>67</sup> 袁昌英：〈結婚前的一吻〉(獨幕劇)，《現代評論》第8卷第209期，1928年12月。

子的心。

我成天的用笑臉待一切人，遇到蔣平來到房中也把**英雄本色**顯出，同他說笑談那他所欲知道的北京廟會夜市情形。……<sup>68</sup>

如此用法無關政治，而是回歸到最初「雄性」的意涵。這或許是英雄摘除菁英冠冕，往「群眾」回歸歷程中的一種附加影響。人們更輕鬆地談論英雄，反映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英雄已不再有那麼迫切的需求。

#### （四）轉向性格描述

進入此期，「英雄」又回歸到普遍用於「泛稱」的狀態而不再專指，但其泛稱指涉，又與傳統「浪花淘盡英雄」的概念不等同，更大層面指稱某種人物性格，或人們嚮往的理想男性形象：

中國女子向來崇拜的是才子，同樣西洋女子崇拜的是**英雄**。這幕戲裡的臘綺娜 Raina 就是一個崇拜**英雄**的浪漫女郎。<sup>69</sup>

文中引入西方愛情觀，將中國「才子」與西方「英雄」對舉，表達了一個「浪漫女郎」對於愛戀對象的憧憬懷想，指出「英雄」的陽剛特質，乃女子的新式擇偶條件。此處之「論英雄」，重點並非強調某個特定的英雄人物在其雄性沙場上如何愛國、如何建立自己的功業，此處「英雄」的言說，重在標榜一種合適於婚戀的人物性格。

我們也可以看到「英雄」一詞被直接拿來形容女子：

女子有**英雄**性格的人很不少，只不過她們受壓迫太重，教育不深，常將那種偉大豪傑的人性自小就一點點的磨滅了。<sup>70</sup>

<sup>68</sup> 懋琳：〈舊夢〉，《現代評論》第8卷第190期，1928年7月、第193期，1928年8月。

<sup>69</sup> 西澄：〈武器與武士〉，《現代評論》第5卷第102期，1927年3月。

<sup>70</sup> 袁昌英：〈結婚前的一吻〉（獨幕劇），《現代評論》第8卷第209期，1928年12月。

「英雄」在此的泛稱乃就「性格」而言十分明確。至此呼應了梁啟超早在1902年所提出的「二十世紀以後將無英雄，何以故？人人皆英雄故」<sup>71</sup>的前瞻概念，表達了對於全體民眾素質與自信心的殷切期許與肯定。

## 六、結語

透過考察，我們更宏觀地了解1830-1930年間「英雄」一詞的使用情形，發現其轉變趨向有二：其一、由「官方論述」轉向「政治論述」再轉「文化論述」；其二、由「個人菁英」轉向「群體大眾」及「個性化」論述，從「說英雄→盼英雄→質疑菁英英雄→人人皆無名英雄」的歷程，昭示了人群對於理想願景的思考。

清末民初，人民對於英雄的渴求已無法透過「小說想像」獲得慰藉，甲午戰爭之後，真實版的「英雄譜」在危急存亡之秋被急切地建立起來。「英雄」多有專指，「領導者」的意義強化，反映當時群眾的無助心境。其間的意圖是很「中國」的，但所借助的「英雄觀」卻是切斷原本儒家「忠義」觀之後，參雜了「西方觀點」的概念。民國建立後，眾人開始批判領導權威，肯定小人物為無名英雄，英雄的意義更趨近於「自我價值」的完成，反映出來的是群眾心理狀態的相對安頓穩妥。惟與此同時，內戰又起，英雄觀念再被大大批判或彰顯。紅衛兵打著打倒英雄主義，彰顯群眾價值的旗號，進行了對於毛主席的無條件崇拜；臺灣則形塑了蔣介石的英雄神話，直至解嚴後，所謂「英雄」，才逐漸打破單一種形象與定義，而涵納更多元可能。

走向二十一世紀，臺灣隨著時代變遷，已走入去英雄、沒有典範的世代，人人都可以是自己小領域裡的大英雄。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裡的坐姿蔣介石肖像，原本高高在上供人瞻仰，近年校方在肖像基臺

<sup>71</sup> 梁啟超：〈自由書〉，收於《飲冰室專集》，卷2，1899年。

兩側擺上舒適的坐墊，不時有年輕學子倚著肖像讀書——原本神聖不可侵犯的「先總統 蔣公」一轉而為陪伴學子的親切「蔣爺爺」——「英雄」不再那麼「偉大」，而更和藹可親了。此一變革可簡單視為英雄形象的消解，但細究之，何嘗沒有透露人心想望？原來，此時此代，「親切陪伴」較「權威領導」更形重要！不啻是另一番值得重視的世代觀念變遷言說。

當然，英雄觀的轉變並非直線單向的進展，各期之間多重意涵時有重疊、歧異。仔細想來，無論建構、消解或轉向，其實都是世代英雄觀念「建構」的一種形式。時至今日，所謂建功立業、人生價值的追尋，不再具有齊一性，新世紀的「英雄觀」更豐富細緻，也更破碎而眾說紛紜了。然若回歸「本質」，「英雄」的語彙運用其實終不出花、鳥而至傑出者的源起概念。可以說，歷經清末民初英雄觀的建構、消解與轉向，人們在欣賞「一枝獨秀」之餘，也學會了轉換視野，發現「百花齊放」、「百鳥齊鳴」的熱鬧景象。於是，「英雄」成爲一種可以選擇、可以容納更多元定義的願景想像。

（責任編輯：詹荃亦）

## 徵引書目

- 〔美〕悉尼·胡克（Hook Sidney）著，王清彬等譯：《歷史中的英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王銀輝：〈近代四大小說雜誌中的英雄觀〉，《開封教育學院學報》第26卷第3期，2006年9月，頁17-19。
- 李宏波：〈英雄傳奇小說與英雄觀的演變〉，《語言文學研究》，2009年6月，頁9-10。
- 李寶紅：〈梁啟超英雄觀辨〉，《湖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頁62-67。
-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頁81-158。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何冠彪：〈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入祀文廟始末〉，《漢學研究》第9卷第1期，1999年3月，頁71-89。
- 洪詠秋：《「三國演義」與「水滸傳」英雄觀之探析》，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 崔小茹：《清末民初的達爾文進化論》，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
- 陳平原：〈英雄與歷史：以民間敘事為根基——明代章回小說論略〉，《中國文化研究》第12期，1996年夏之卷，頁53-62。
- 傅才武：〈煮酒論英雄——中國古代英雄標準探微〉，《歷史月刊》第146期，2000年3月，頁102。
- 葉柏奕：《英雄建構——六朝筆記小說中的譙國龍亢桓氏人物書寫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 葉常虹：《英雄：一種流行於亂世的政治文化現象——以漢魏為考察

- 範圍》，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 劉志偉：《英雄文化與魏晉文學》，甘肅：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
- 歐陽健：《歷史小說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建置，網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ttswebquery?@hanjiquery>，檢索日期：2011年5月12日。
-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